

美国基督新教传教士彼得·伯驾研究述评

杨 楼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河北·石家庄 050091)

摘 要 彼得·伯驾(Peter Parker 1804-1888)是美国基督新教来华传教士的典型代表。1834年在美部会决策委员会的批准下来到中国,在华活动二十多年,其身份集传教士、医生和外交家于一身,亲身经历并参与了早期中美关系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本人在充分肯定国内外学术界对彼得·伯驾研究概况评述的基础上,对推进其研究提出新的视角。

关键词 彼得·伯驾 研究 述评

中图分类号 K712

文献标识码 A

彼得·伯驾(Peter Parker 1804-1888)是美国基督新教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传教士。从美部会的授权看,彼得·伯驾是以医疗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的,因此,在华期间开办了广州眼科医院并筹建了“中华医学传教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对中国近代医学事业的发展 and 早期中美交流做出贡献。同时,彼得·伯驾非常强调福音的传播,通过身体拯救灵魂,将医学传教视为一种向中国传播基督福音的必要策略。但是十九世纪上半期的清帝国并没有对基督教完全开放,彼得·伯驾基于自身强烈的宗教情感,加之在早期的中美外交关系中,美国缺乏对中国的足够了解,所以彼得·伯驾在1840年至1855年受雇于美国政府,参与了一系列外交活动,在早期美国对华外交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1 国外研究现状介绍

目前,彼得·伯驾生前大量的书信、日记、报告等原始材料主要藏于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以及美部会的教务报告。国外学者对于彼得·伯驾研究所需的资料多于此。从美部会的授权看,彼得·伯驾是以医疗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的,所以国外学术界对他医学传教领域的研究最早且最深入。1896年美国史蒂文斯和马克维奇(George B. Stevens and W. Fisher Markwick)通过整理彼得·伯驾生前大量的书信和日记等原始文献,撰成《传教士、医生、外交家、医疗传教之父和广州眼科医院的创造者——伯驾牧师的生平、书信和日记》,是第一部全面介绍彼得·伯驾的专著,该专著直接引用了较多精品文献来充实作者的论述,相对全面而真实地反映了彼得·伯驾的一生。书中对于彼得·伯驾在华的医疗传教事业进行了独到而细腻地叙述且给予充分肯定,认为“伯驾博士所从事的事业,减轻了患者的痛苦时候,其疗法可以被中国人所掌握,而医学及外科知识会在中国人无数同胞们身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也肯定了彼得·伯驾在中国所推行的传教方法是“最安全、最明智而又最迅速的的方式,是一项真理与文明的伟大事业”。足可见作者对其医疗传教事业的完美评价。

另一部较为全面研究性专著是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East Asian Studies in Harvard University)的特别成员美国教师爱德华·V·吉里克(Edward V. Gulick)在承担研究彼得·伯驾的工作时期完成的专著《伯驾与中国的开放》。同样,该书以时间为线叙述了彼得·伯驾在华的一生。作者也同样推崇彼得·伯驾的医疗传教活动,书中对广州眼科医院的开办、医疗传教制度化,西医入华和西医教育做了详细的阐述。认为他的医疗传教工作的核心目标是“热情地拯救灵魂”,他的医疗传教事业“实现了国际交往中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突破,是基督福音的真正诠释”,而彼得·伯驾本人是“十九世纪一位沟通东方和西方的先驱,具有世界主义精神的传教人物,医疗传教士的具有权威性的典范”,基调颇高。

美国基督新教来华第一位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主编了长达二十卷的《中国丛报》。该著作中不仅刊登有彼得·伯驾给美部会撰写的医务传教报告,而且也记述了他在“中华医学传教会”的活动。对于彼得·伯驾凭借医疗传教向中国这样的异教国家推行基督福音的方式给予阐释,认为他“不但在中国开创了后来成为传教支柱的新式传教事业,也架设了与中国人新的交流渠道”。

上述的研究专著且深入,对于彼得·伯驾在华的医疗传教活动有着深刻的阐释。进而认为彼得·伯驾的医疗传教活动一方面为当时的中国带去了西方近代的医学技术,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作出贡献,另一方面也肯定了他通过医疗让心中的耶稣基督拯救异教徒心灵的传教方式。

然而,彼得·伯驾是作为医疗传教士来到中国的,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却受雇于美国政府,这样使他具有双重身份。关于彼得·伯驾的这一活动,国外学术界并没有专著出现,同样是很分散地见于研究此阶段中美关系的专著或文章中。即使要在这方面编出一个比较完整的目录也非易事,所以择其精品,并提炼国外学者对彼得·伯驾在早期中美关系活动中的研究观点。在《伯驾与中国的开放》一书中,作者爱德华·V·吉里克认为“很难对伯驾的一生作出公正的评价”,“伯驾是一个主要人物,比一个著名的外交官有意义得多,但他的特别成就并非外交,他在严格的外交领域并不重要。详细考察他的政府工作,基本上是无意义的”。美国学者泰勒·丹涅特(Dennett, Tyler)在《美国人在东亚——十九世纪美国对中国、日本和朝鲜政策的批判性研究》一书中,对于彼得·伯驾在华的外交活动给予了一定篇幅的论述,重点阐述了彼得·伯驾在台湾问题上的见解,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伯驾博士的政策不是什么错综复杂或不可捉摸的,无庸加以分析”。总的来看,美国学术界对于他在早期美国对华外交中的评价并不高,但是比较客观的。

彼得·伯驾在中国的活动中,除了国外学者比较关注的医疗传教和外交领域外,还体现在他与商人和商业活动的关

系上,可以侧面印证彼得·伯驾是如何看待商业利益和传播基督宗教二者之间关系的。关于此,最初的“中华医学传教会”的报告中可窥一斑:“中国人抵制福音,拒传教士于门外,是由于长期的隔绝和贸易上的障碍造成的,医务传教活动可以促进西方和中国的商业往来”。所以彼得·伯驾并不排斥商业活动,但是目前的国外学者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此外,关于彼得·伯驾的中国观方面,也并未形成比较完整而准确的观点,但是,有相当数量的专著从整体出发论及了不同时期西方人的中国观,而且随着中国社会的演进变化,其中国观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也影响着中外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

2 国内研究现状介绍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学术界对于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无论从研究成果的广度和深度,还是从数量与水平以及研究的范式来说都较之前有提高。伴随这样的研究现状,国内对于传教士彼得·伯驾在不同领域活动的研究近几十年来也颇出新作。

国内学者对于彼得·伯驾在医疗传教领域的研究是比较深入也比较完善,一方面,认为他通过在华开办医疗事业,引进了西方近代的西医理论和技术,对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和中美文化的交流做出贡献,何大进的《晚清中美关系与社会变革——晚清美国传教士在华活动的历史考察》中,对彼得·伯驾的医疗活动给予了关注,认为诸如医疗等美国赴华传教士的文化活动,“不仅传播了西方的文明,推动了中国近代的一些等各项事业的发展,而且进一步打破了中美两国之间的隔绝状态,对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重视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顾卫民在其专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中,同样认为“早期基督教新教传教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宣教的同时辅之以西方科学和人文思想的传授”。另一方面,对于彼得·伯驾“医疗传教”这一特殊方式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认为深层次的原因有二:其一,通过“医疗传教”这种方式逐步推进在华的基督事业,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中就彼得·伯驾“医务传道”给予了很详尽的论述,认为“是为传教事业开辟道路,且已上升为开辟并全面扩大中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之道路,既全方位进入中国,并按他们自己的方式对中国加以改造的手段”。此外,周岩厦的“早期新教传教士以教育、知识传播与医务活动促进传教事业述论——以《中国丛报》为中心”一文和香港基督教文化协会会长李志刚牧师在其专著《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中,都对彼得·伯驾的医疗传教也做了详实分析。其二,认为彼得·伯驾以医疗传教活动为掩护,从而达到为国家政治利益服务的目的。顾长声的《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中,对彼得·伯驾的医疗活动作出这样的评述:“伯驾不敢公开传教,只是通过免费治疗,以赢得老百姓对外国人的好感,同时尽可能地向病人搜集中国内地的情报”。还有李传斌的“医学传教与近代中国外交”一文,均具有代表性。

另外,彼得·伯驾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先后担任美国使团秘书、中文翻译以及驻华公使,所以研究这一阶段他活动的学术著作或文章也屡见不鲜,并提出不同观点。台湾学者李定一的《中美早期外交史 1784-1894》这部著作中,对于彼得·伯

驾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的活动给予了及其详细的论述和评价,特别是对其侵台计划的前前后后有很详实的分析,从侵台进化提出的原因上讲,是“力求表现一番,使他平淡无奇的任期可以渲染为成果辉煌外,还有政治上、军事上、商务上以及私人情谊上等因素”,由于彼得·伯驾的侵台计划仅是个人或极少数美国在华官员与商人的主张,不代表全美国政府,所以在作者看来,彼得·伯驾“使华时期所惟一值得一提的贡献”是改变了美国“使华文武官员有极大自由行事的权力”。乔明顺的专著《中美关系的第一页——1844年〈望厦条约〉签订的前前后后》对于彼得·伯驾在《望厦条约》签订的全过程给予记述,直指“伯驾来华后的活动充分证明他始终以传教医士的身份为美国谋取利益”。顾长声以传教士所依托和推行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为主线,而撰写的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华史的专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持彼得·伯驾是“国际联合武力侵华的最激进者”这一观点的《美国侵华史》的作者卿汝楫,认为“彼得·伯驾是《望厦条约》的主要受益者”这一观点的《中外宗教交流史》的作者楼宇烈、张志刚和一些文章都对彼得·伯驾在华的政治活动有所论及。由此,对于彼得·伯驾在早期中美外交领域的研究观点认为:彼得·伯驾利用宗教这一神圣的外衣深入了解中国各种情况,为美国经济、政治、文化的侵略提供各种情报、资料和帮助。相反地,对于为何传教士身份的彼得·伯驾会从事世俗的政治活动,汪波发表了“彼得·伯驾于美国早期对华外交”一文,文章论述了他从鼓动美国政府积极参与对华事务到自身的实际活动的全过程,特别是作者对于传教士身份的彼得·伯驾为何会积极参与政府活动的动机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即“实现基督教在中国自由传播的理想”,观点颇新。

参考文献

- [1]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70.
- [2] 李传斌.医学传教与近代中国外交.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5(7).
- [3] 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
- [4] 乔明顺.中美关系的第一页——1844年《望厦条约》签订的前前后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94.
- [5]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 [6] 卿汝楫.美国侵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62.
- [7] 楼宇烈,张志刚.中外宗教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388-389.
- [8] 汪波.基督教传播对早期中美外交关系建立的影响.世界宗教研究,1999(2).